

孙中山在上海的风云岁月(下)

◆ 王琪森

1912年10月10日。这是中华民国成立后的第一个国庆。此时的上海,秋高气爽,景色绚丽。当晚,在位于十六铺的新舞台举行了一场大型的国庆京剧汇演。孙中山、黄兴、陈其美、李平书、王一亭、沈绂云等人均在包厢内就座。新舞台是海派京剧艺术发展的直接产物,也是当时中国第一座现代化的戏院。1908年10月,上海实业家沈绂云、张逸槎及海派京剧的开创者潘月樵、夏月珊、夏月润等人集资建造。新舞台的设备在1912年后,又作了更新,因而在当时是全国最先进的戏园。

在一片震耳欲聋的掌声和欢呼声中,孙先生欣然走上舞台,他亲切地向座无虚席的一至三层观众挥手致意,然后提高语调作了简短的致词:“今天,我很高兴出席上海伶界联合会的国庆庆贺演出!中华民国成立一周年了,我们要振奋精神,建设民国,争取光明之前景!”台下群情激奋,随之响起了阵阵“民国万岁!”“共和万岁!”的口号声。“我今天也借这个喜庆的机会,祝贺上海伶界在传统京剧改良上及新编京剧演出上所取得的骄人业绩,这将起到移风易俗、教化国民的巨大作用,也有助于社会革命之进步!”

定居上海图大业

上海北站。1913年3月20日晚上10点多。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奉袁世凯电邀即将启程赴北平。黄兴、陈其美、廖仲恺、王一亭、陈勤等人均前来相送。10时45分,宋与大家一一握别,当他走到检票口,突然间响起了令人颤栗的枪声,只见宋身体一震,随即忍痛说道:“我中枪了。”随即又响了两下枪声,

震惊中外的宋教仁遇刺案发生了。

此时的孙中山正以筹办全国铁路全权的名义,与马君武、戴季陶、何天炯、宋耀如等一起访日。当孙中山获此噩耗后,悲愤异常,即于长崎乘“山阳丸”启程回国。3月25日抵上海,当晚即到黄兴寓所,相见泪下。他伤心地说:“不竟海外归来,失此良友,为党为国,血泪皆枯!”

不久,袁世凯在总统府召开秘密会议,严厉指责孙中山、黄兴等人“捏词耸听,淆乱人心”,宣称要“除暴安良”。随即解除了江西李烈钧、广东胡汉民、安徽柏文蔚的都督职务。孙中山在上海紧锣密鼓地策划讨袁之事,上海已成为国民党的指挥中心,酝酿着二次革命。7月8日,李烈钧奉孙中山之命,从上海潜返江西湖口。7月12日,李在湖口起兵,二次革命正式爆发。

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离开上海赴日避难,宋耀如也带领全家流亡到日本,他们时常相聚,共商反袁大计。1914年9月,宋霭龄回上海与孔祥熙结婚,其秘书工作由妹妹宋庆龄接替。爱情的火苗在孙中山与宋庆龄心中悄悄地燃起。1915年夏季,宋庆龄陪母亲回上海看病,当宋家知道宋庆龄要嫁孙中山时,父母竭力反对,并将女儿软禁在家中,孙中山派自己的秘书到上海去斡旋及营救宋庆龄,于是在上海与东京两地上演一幕惊心动魄的孙宋之恋。10月,宋庆龄终于跳窗而走,来到东京后即与孙中山走进了婚姻的殿堂。

1915年12月13日,袁世凯在居仁堂举行登基大典,黄袍加身,接受众臣的朝拜。随后,袁下令将民国

五年改为洪宪元年。1916年3月22日,众叛亲离的袁世凯不得不宣布取消帝制。6月6日,在全国一片讨伐声中,袁世凯黯然死去。

1916年5月1日,孙中山与廖仲恺、戴季陶由日本返回上海,亲自主持讨袁事宜。5月9日,发表《第二次讨袁宣言》。上海再次成为革命党人反袁的指挥中心。5月18日,孙中山最亲密的战友、上海革命党的领军人物陈其美被暗杀于萨坡塞路14号总机关部,孙中山不顾个人安危,前往吊唁,尊其为“民国长城”。第二天,宋庆龄由日本回上海,孙与宋秘密租赁环龙路63号。宋庆龄的柔情与照顾,使孙中山得到了莫大的安慰。10月30日,黄兴弥留之际,孙中山至寓所探望。第二天黄兴便病逝。11月8日,蔡锷在日本病逝。12月5日,灵柩运到上海,孙中山、唐绍仪等前往招商局码头迎灵,孙中山赞誉蔡为“再造民国”。

1917年早春二月,痛失革命战友、爱将的孙中山,在宋庆龄的陪伴下,潜心于《建国方略》的撰写。7月1日,辨帅张勋在北平复辟,全国声讨。7月3日,孙中山在寓所与唐绍仪、章太炎、程璧光等商量讨伐叛逆。9月1日,被国会非常会议举为中华民国军政府大元帅。

1918年6月访日归来,船抵上海后,即入住法租界莫利哀路29号。这是一幢建造得颇为考究的欧洲乡村式小洋房,系几位加拿大华侨买下后送给孙氏夫妇。从而使长期来在上海居无定所的这位革命领袖,终于有了一处环境幽静的安身立命之地,使孙中山能认真思考革命前景,总结经验教训,并潜心研究

革命理论。就在这一年,孙中山完成了阐述他思想体系的《孙文学说》及指导中国经济建设的《实业计划》等重要著作。

1919年5月28日,在莫利哀路寓所发表《护法宣言》,认为“国内纷争皆由大法不立。”6月,指派戴季陶、沈玄庐在上海创办《星期评论》。8月指派朱执信、廖仲恺在上海创办《建设》杂志,使上海继辛亥年后,又成为革命党第二次舆论宣传的中心。10月10日,在上海宣布改组中华革命党为中国国民党,公布以“巩固共和,实行三民主义”为宗旨,设本部于上海环龙路44号。1920年这一年,孙中山大部分时间都在上海,忙于改组国民党及对桂系军阀的征战,并开始接触布尔什维克党人及共产国际的使者。是年11月25日,偕伍廷芳、唐绍仪、胡汉民、戴季陶、马君武及夫人宋庆龄从上海赴广州,重组军政府。

1922年6月15日,粤军陈炯明部发生叛乱,孙中山在“永丰”舰上避难55天。宋庆龄则离开广州回上海父母家。孙中山于8月14日回到黄浦江畔。当时的上海正是暴风雨来袭,但还是有2000民众冒着大风大雨去码头迎接孙中山,这使孙倍觉上海民心之可贵。陈炯明的叛乱,是孙中山一生中遭遇的最惨痛的失败。他回到莫利哀路寓所后,进行了认真的思考,使他在思想上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就在回来后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内,他先后在寓所会见了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中国共产党的代表李大钊,讨论“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的问题。10月10日,在寓所内为蒋介石所撰《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一书作序。年底,致

信列宁,告诉不久将派代表去莫斯科同他磋商合作事宜。

1923年元月元日,孙中山在上海发表了《中国国民党宣言》《中国国民党纲》,宣布以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为建国纲领。第二天,在孙中山领导下,中国国民党改组大会在上海召开,并通过了党纲和总章。孙中山在会上作了有关政治、军事、党务的重要发言。1月17日,上海各团体代表60多人前往孙中山寓所,祝贺滇、桂联军攻克广州。

1924年1月1日,上海《民国日报》出版元旦增刊“中国国民党改组号”,发表国民党改组的文献。孙中山在大本营庆祝中华民国十三周年暨授勋典礼,此后主持、指挥北伐。11月4日,冯玉祥等人致电孙中山,促其北上,谓“此后一切建设大计,乃请先生指示。万望速驾北来,俾亲教海是禱。”1月17日清晨,孙中山、宋庆龄一行由广州抵达上海,上午10时,孙中山在莫利哀路寓所会见记者,强调“惟奠定国是全仗国民通力合作。”下午,孙中山又在寓接见了冯玉祥的代表马伯援,详询京津情形。11月22日晨7时,孙中山、宋庆龄乘上“上海丸”轮取道日本赴天津再转北平。沪上民众数千人在码头相送,8时30分,轮上鸣钟,孙中山依栏脱帽向送行者告别,黄浦江水似镜,定格了一代伟人这永恒的挥手身影。

1925年3月12日上午,抱病北上的孙中山在北平逝世,享年59岁。孙中山在弥留之际,口呼:“和平、奋斗、救中国!”上海市民间此噩耗,悲痛不已,“痛哭先生”。(摘自《上海纪实》微信公众号)

傅海澜传

董煜



36.劳而无功

在那段日子里,傅泾波成了司徒雷登最得力的助手,每天不仅要帮助司徒雷登处理那些堆成小山一样的中文信件,还要陪伴司徒雷登去见方面面的的人。有人发现,很多时候这个没有职务头衔的中国人的意见是可以代表司徒雷登的,甚至,为了避免尴尬或给自己留点后路,司徒雷登还会借助傅泾波说出一些他不太好说的话。

司徒雷登曾这么评价傅泾波在他任大使期间对他的帮助,“他从来没有辜负过我的信赖,他成了我外交生涯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成分。虽然美国政府没有花费分文,但是我知道由于他对中国政治的敏锐了解和他与中国人广泛的接触,而使得美国政府受益匪浅。在小事情上他也帮助我,在我忽视的时候,提醒我合适的礼节”。

司徒雷登尽管一如既往地勤勉工作,但结果却是令人失望的。在燕大,司徒雷登也很忙碌,冰心曾在《燕大周刊》上撰文称:“这团体上上下下、前前后后,总有上千上万的人,这上千上万的人的生、婚、病、死四件大事里,都短不了他。为婴儿施洗的是他,证婚的是他,丧礼主仪的也是他。你添了一个孩子,害一场病,过一次生日,死一个亲人,第一封短简是他寄的,第一盆鲜花是他送的,第一个欢迎微笑,第一句真挚的慰语,都是从他而来的。”

那时司徒雷登确实忙,但充实而受人尊重,但做了大使之后,司徒雷登心身疲惫不说,而且劳而无功。

当时大使的主要工作就是协助马歇尔调停国共两党的关系,所以每天都要参加各种会谈,或是在司徒雷登住处与国共代表团以及其他各式各样的人会谈。很快司徒雷登便发现,在国民政府和共产党之间的不信任是如此之深,有时几乎已经看到了和解的曙光,但最后都会因为双方的不

信任或者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导致会谈失败。

1946年5月,蒋介石提出召集国民大会,以通过新提出的宪法。在日期临近时,国民党军向张家口集结,战事重新爆发。张家口在北平的西北,是共产党战略上的一个据点,

张家口的陷落,引起共产党代表团的强烈不满,并拒绝出席国民大会。其实,共产党对这个立宪会议并不感兴趣,他们感兴趣的是建立联合政府。

1946年11月,国共和谈破裂,周恩来在返回延安前宴请司徒雷登,同时还邀请了中共代表团里原先燕京大学的所有毕业生。

周恩来微笑着对司徒雷登说:“这些青年都是你培养的学生,你是燕京大学的校长,可是却为我们共产党培养了人才。”

在南京期间,为了调解国共关系,司徒雷登与周恩来先后会谈过十多次,虽然斡旋最终失败,但他与周恩来彼此都被双方的人格、学识、气度所折服,司徒雷登称周恩来头脑敏锐,个人很有魅力,是个了不起的政治家和外交谈判奇才,周恩来也对司徒先生赞赏有加,临行,周恩来委托中共代表团外事委员会秘书长王炳南将一个绘着“八仙过海”五彩人物的仿明敞口瓷瓶赠给了司徒雷登,同时赠给傅泾波一座延安石刻。

事后有人分析,在中国,瓶是一种吉祥物,寓意平平安安,“八仙过海”,是希望各式人等都要为了中美关系“各显其能”,而赠送石刻,是提醒傅泾波要“时刻”不忘为改善中美关系而努力。解释虽然有点牵强,但可见当时司徒雷登和傅泾波在周恩来心目中的重要地位。

在那段操心劳神的日子,唯一让司徒雷登感到宽慰的是杭州之行。10月18日,司徒雷登对杭州进行了访问。能回到自己的出生地,再一次听到熟悉的杭州话,让司徒雷登十分兴奋。

杭州市市长为他戴上了荣誉市民的桂冠,并送给他一把象征着杭州城市的金钥匙。

年底他又回到燕京大学过圣诞,用自己的薪金购买了800斤大米和猪肉为学生们加餐。

可是不久,司徒雷登就陷入了巨大的失落之中。

54.看得惊呆了

小皮匠说:“我有量天尺。”白寥寥说:“我有鞋拐子。”量天尺就是鞋拐子,这是皮匠的行话,切口,外人听不懂。接下来,小皮匠问得快,白寥寥接口也接得快。小皮匠问什么叫穿山甲?白寥寥回答是纳鞋的针。小皮匠问什么叫小白龙?白寥寥回答是纳鞋的麻线。接下来两个人一问一答,速度飞快。比如“快口”就是切皮刀,“月亮”就是切皮板,“送客”是指榔头,“混海蛟”是指水刷子,“蔽尘”就是鞋面,“托土”就是鞋底,“重圆”是指修旧鞋,“承前”便是指包鞋头,“继后”是指补后跟,“上衬”就是配鞋底……两个人你来我往,表面上风平浪静,行云流水一般,暗地里却是剑拔弩张,火药味十足。小皮匠说:“人不亲,手艺亲。”白寥寥回答:“手艺不亲,锥子把亲。”完了还加了句“承让”。两人互相拱拱手。

那帮人中能一口气说上一大串俗语俚语的戴帽子的家伙,一专多能,拿起两只槓头击打了一下,文比的上半回算是结束了。小皮匠有点懊恼,没能难倒白寥寥。

双方交换位置。白寥寥也不客套,直接进入角色:“一只旧车胎,好打几副前后掌?”小皮匠从容应对:“取出内衬散发丝,男鞋打六副,女鞋七副半。”年轻人问:“一副鞋掌几只钉?”小皮匠说:“前掌十三钉,后掌钉十一。”“钉是什么钉?”“三棱一分尖头钉。”“麻线长,麻线短,纳一只鞋底多少线?”“麻线细,麻线粗,双排缝线四尺五。”年轻人抖一抖身上的皮围兜,说:“围兜两尺长来两尺宽,一把锥子由你戳,上面好戳几个洞?”小皮匠愣了一愣,从来不会有人想过这个问题的,不过这也难不倒他。小皮匠说:“你头上有多少头皮屑,我就能在皮兜上面戳多少个洞。”白寥寥的年轻人似乎有点难为情,搓搓手,朝胎记看看,意思是再也问不出什么了。小皮匠松了口气,以为这个回合结束了。不料白寥寥的年轻人眼珠一转,突然问道:“小菜场里一指半宽的小带鱼,多少钱一斤?”除了比武的双方,还有不多几个看热闹的,此时都笑了,这个问

题太简单了,不过知道两个人在较劲,谁都不发声。偏偏这个问题难倒了小皮匠。小皮匠从来不买菜的。以前是广东嫂嫂帮着代买,现在广东嫂嫂不来了,小皮匠偶尔会叫隔壁的宁波阿娘顺便带一点。小皮匠脸色很难看,心想皮匠比武,居然问出小菜场里小带鱼几钯一斤的问题来,太怪了,当下便反问道:“你说多少钱一斤?”白寥寥笑了,说:“我们到上海的第二天,就去兜小菜场。一指半宽的小带鱼,一毛五分钱一斤。比我们那块便宜。”小皮匠提出抗议,这个问题要赖皮,不属于比武的范围。胎记笑着拍拍他肩膀说:“老弟,皮匠也要吃饭啊,难道你不食人间烟火?”

戴帽子的家伙不失时机地敲了下槓头,宣布:“第一回合,滨海小白脸赢,同和小皮匠输。”

小皮匠脸色发白。

接下来是第二回合,武比。早有人滚过来两只汽车轮胎,轮毂已经卸掉了。胎记宣布比武规则:双方自备工具,切割轮胎,把外胎、内胎、角边、散发丝分门别类,切割成片。速度快者胜出。小皮匠头皮发麻,束手无策。小皮匠买来旧轮胎,都是送到修理厂里去机器加工开片的。全上海的皮匠买来旧轮胎,都是送到修理厂里去由机器加工开片的。没有一个皮匠有本事自己切割轮胎,这是不可能办到的,没有这个力道,也没有这种工具。小皮匠轻轻地冷笑一声,等着看对方出洋相。

说俗语俚语的家伙又兴致勃勃地敲了下槓头,算是比武开始。只见白寥寥从箩筐里拿出个狭长的油布包,抖开来,露出精光锃亮一把怪刀,造型奇特,有点像镰刀,刀口却是方的,如斧头一般宽窄,但比斧头的刀身薄。小皮匠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工具,或者说,这根本就不是皮匠的工具。白寥寥大喝一声,手起刀落,刀口已经深进轮胎的一半。白寥寥全身压上去,凝神屏气,猛一发力,居然一切到底,比百货店里斩火腿斩得还要爽气。小皮匠看得惊呆了。轮胎居然还有这样的破开法。这个瘦精精白寥寥的年轻人居然有这样的神力。

同和里



王承志